

论贺拉斯·曼教育改良社会的思想

李子江,杨雪芬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

摘要:教育改良社会的思想是贺拉斯·曼公共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不断探索教育与人性、国家以及社会之间的关系,贺拉斯·曼形成了教育是人类趋向完善的加速器、教育是捍卫共和国自由的堡垒以及教育是稳定社会秩序的道德事业等教育思想。贺拉斯·曼教育改良社会思想的形成受到第二次宗教大觉醒运动中人性进步观念、社会改革精神以及颇相学教育观念的影响,源于他对通过教育解决美国社会问题的不断思考与实践。贺拉斯·曼的公共教育思想与实践促进了美国公共教育的复兴和共和精神的传播,但公共教育却并非是治愈美国社会弊病的解药。

关键词:贺拉斯·曼;教育改良社会;公共教育思想;公共教育运动;第二次宗教大觉醒

中图分类号:G4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20)01-0145-07

贺拉斯·曼(Horace Mann)是19世纪上半叶美国著名的公共教育改革家,被誉为“美国公共教育之父”。19世纪上半期,伴随着新的移民潮以及美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年轻的共和国面临教派林立、政党纷争、阶级矛盾等各种社会问题。贺拉斯·曼成为力求稳定共和国社会秩序的忠诚卫士,他将公共教育与社会进步紧密联系起来,希望通过公共教育来改良美国社会^{[1]98}。在贺拉斯·曼的倡导下,公共教育逐渐从一种家庭事务转变为公共事务,被人们视为促进人类完善、维护共和国自由、稳定社会秩序的手段^{[2]117}。实际上,贺拉斯·曼教育改良社会思想的形成并非是一蹴而就的,19世纪早期的宗教复兴深深影响了当时的公共教育运动^[3],在形塑他的公共教育思想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些因素却并未引起学者们的重视。目前,学界对贺拉斯·曼的研究大多围绕其担任马萨诸塞州教育委员会秘书期间的公共教育思想及实践展开,有关贺拉斯·曼教育改良社会

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背后动因的探究相对比较缺乏,尤其是对公共教育改革与第二次宗教大觉醒(the Second Great Awakening)^①之间的关系研究不足,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教育思想与历史语境之间的联系。本文将贺拉斯·曼置于当时宗教、社会变迁的历史语境中,沿着他的人生轨迹和职业生涯,重塑他的教育改良社会思想的形成过程并揭示其背后的动因,力图客观评价其教育思想的历史贡献,丰富学界对贺拉斯·曼公共教育思想的认识。

1 教育是人类趋向完善的加速器

许多学者认为,早期的生活环境对贺拉斯·曼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最具影响力^{[1]102,[4]101}。贺拉斯·曼于1796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富兰克林镇。当时,受美国工业化的影响,清教徒珍视的传统道德观正被人们的物质欲求不断侵蚀^[5]。与此同时,第二次宗教大觉醒促使理性的宗教观念逐渐

收稿日期:20191022

基金项目: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课题(18YJA880052)

作者简介:李子江(1968-),男,湖北十堰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美国教育史研究。

①按照美国学者福格爾的观点,美国历史上共发生了四次宗教大觉醒。第一次大约从1730年到1760年,第二次大约从1800年到1840年,第三次大约从1890年到1930年,第四次大约从1960年开始。第二次宗教大觉醒的特征就是将宗教复兴与社会目标相结合,刺激了一系列社会改革运动,如禁酒、女权运动、反奴隶制、公共教育改革等。参见[美]罗伯特·威廉·福格爾,第四次大觉醒及平等主义的未来[M].王中华,刘红,译.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35-36。

取代了旧的宗教教条,这构成了贺拉斯·曼理解教育与人性关系的宗教和社会背景。

贺拉斯·曼的父母都是重视文化和宗教信仰的清教徒。由于家庭贫困,贺拉斯·曼没有接受太多正规的学校教育,但父母对文化的重视却培养了他热爱知识的态度。贺拉斯·曼经常在镇里的图书馆自学,通过广泛阅读历史和神学书籍,他认识到当前一代人精神和教育的缺失,并致力于改变这种状况,他说:“如果我有能力,我将把图书馆散播到整个土地上……”^{[6]12-13}父母虔诚的信仰同样影响了贺拉斯·曼。孩提时期,贺拉斯·曼像其他儿童一样接受着加尔文教义的熏陶。但在他12岁时,他的兄弟史蒂芬(Stephen)在主日期间外出游泳意外去世,牧师借机恐吓其他信徒:信仰不虔诚便会受到上帝的惩罚。此事成为贺拉斯·曼反叛加尔文教义的导火索,他开始质疑上帝惩罚的可信性^{[7]11},并逐渐建构起一种新的基督教道德标准和教义^{[8]13}。

贺拉斯·曼宗教观念的转向正是美国第二次宗教大觉醒的缩影。这场宗教复兴运动开始于18世纪90年代末期,一直持续到19世纪40年代。宗教复兴推动了两大宗教观念的变化:一是强调“至善论”(Perfectionism),否定原罪论、宿命论,认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祛除邪恶获得救赎,从根本上否定了加尔文主义的人性观与社会观^{[9]26};二是提倡“千禧年论”(Millennialism)^①,唤起了人们对在美国建立上帝之国的希望。宗教觉醒推动了一神论(Unitarian)^②的诞生^{[10]129},这种宗教哲学强调教育可以塑造年轻人的品性,使他们克服基本的欲望从而走向理性和道德^[11],为贺拉斯·曼有关教育的所有高尚论调奠定了基础。贺拉斯·曼开始肯定个体的进步性,他乐观地宣称,“我相信人类可以改善,且可以加速改善”^{[12]211},而促进人类加速改善的方式就是教育。宗教与道德的水乳交融成为贺拉斯·曼宗教观的重要特征,就像有学者所说的

那样:“那些在别人看来是宗教的东西,在贺拉斯·曼看来是道德。”^{[7]12}

家庭的文化氛围和宗教复兴的乐观精神激励着贺拉斯·曼对知识的向往。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是本能而不是财富或名誉驱使我朝向知识……我所有孩提时代的梦想都是希望为人类的利益做一些事情……并且,我深信知识是最需要的工具。”^[13]1816年,贺拉斯·曼考入了布朗大学。在布朗大学自由的氛围中,他为梦想找到了坚实的知识基础^[14],遂更充分地理解了“知识是为人类幸福效命的工具”这句话的含义^[15]。他的人道主义倾向也得到充分发挥,开始“感觉到真正的宗教就是培养一种社会责任感”^{[6]18}。

除了知识的滋养,实践活动对贺拉斯·曼的影响似乎更为重要。1817年,贺拉斯·曼加入了布朗大学著名的辩论社——联合兄弟协会(the United Brothers Society)^③,他曾多次在协会主办的辩论和演讲活动中阐释他的理想——受过教育的人应承担起为人类造福的社会责任^[16]。在毕业典礼中,贺拉斯·曼的毕业演讲《促进人类的尊严和幸福》(*The Gradual Advancement of the Human Species in Dignity and Happiness*)将一神论主张的乐观精神和使命意识阐释得淋漓尽致,充分展示了他在自由派福音主义^④影响下的社会观和教育观,即虽然社会中仍然广泛存在异教徒、怀疑论者和邪恶者,但受过教育的人终将消灭掉这些痛苦的根源,人类也会发展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智慧和美德将会增加,慈善家将会帮助需要救济的人,自由机构将会废除压迫……千禧年就在眼前^{[8]23, [16]}。

可以说,宗教复兴中兴起的人性进步观是他思考人性、社会和教育之间关系的重要基础。虽然当前社会中传统的道德精神正在被侵蚀,但贺拉斯·曼坚信教育能帮助人类铲除邪恶、提高智慧和道德,因此,教育是人类趋向完善的加速器。对人性、教育和社会持有的进步信念成为他未来

①千禧年一词出自《新约·圣经·启示录》,指耶稣将在1000年后再次降临人间,并在世界上建立和平与公正的国家,也就是上帝之国。这种乐观的末世说成为刺激基督徒们改革现世的动力。

②一神论又称一位论。通过清教徒从欧洲带到美国,并发展为一种自由主义、理性主义与福音新教的结合物,强调人性本善和对更高标准的道德生活的追求。第二次大觉醒期间,其影响不断扩大,一神论教徒将宗教活动从思想领域转到社会领域,其信条在实践中演变为人道主义。贺拉斯·曼的社会改革事业就是基于这种人道主义关怀。

③该协会成立于1806年,是当时布朗大学著名的学生社团之一,主要关注早期共和国的政治活动,并致力于阐释和推进杰斐逊主义的美德。

④福音主义根植于美国的清教主义和两次宗教大觉醒。美国的福音派是指个人以信仰《圣经》为基础的教徒,在第二次宗教大觉醒时期占据了正统地位,并分裂为保守和自由两派,自由派神学是伴随着美国的现代化和世俗化产生的,他们利用科学与新学说重新解释圣经,强调上帝的现实性,最典型的体现就是一神论思想。参见董小川.美国宗教史研究[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65-70.

工作的重要支撑点,他毕生都在践行着孩提时代的梦想——为人类行善。

2 教育是捍卫共和国自由的堡垒

从布朗大学毕业后,贺拉斯·曼开始从事法律和政治工作,投入到社会改革的潮流中,真正成为他所宣称的“受过教育的人”,并在此期间认识到公共教育对共和国自由的重要性。

19世纪初,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拉大了贫富差距、激化了劳资矛盾,城市犯罪问题也不断增加;另外,伴随着新的移民潮,大量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德国人、英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充斥着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损害了本地人的经济利益。经济上的矛盾加剧了政治和文化冲突^{[9]80},特别是宗教偏见,在煽起排外主义情绪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0]80}。19世纪30年代,随着不同阶级、宗教、种族之间的异质性冲突愈演愈烈,如何有效地解决社会异质性问题、维护共和国的民主与自由成为改革者们探寻的主要话题。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第二次宗教大觉醒将宗教复兴与社会目标紧密联系起来,强调“宗教复兴对于保证美国社会与宗教制度万世不朽的重要作用”^{[9]218}。随着宗教复兴的推进,一种比一神论更为激进的流派——超验主义产生了。超验主义者拉尔夫·爱默生(Ralph W. Emerson)宣称,“人类及其社会制度能够被无限地改进”,从哲学原则上确立了整个社会改革运动的合理性^{[1]93}。同时,福音领袖们也不断地向人们灌输这样一种宗教使命观:社会改革旨在将美国塑造为基督二次转世的福地,以迎接千禧年的到来^{[9]27}。从这方面讲,宗教觉醒孕育了改革。正如大觉醒时代的著名人物查尔斯·芬尼(Charles G. Finney)所言,“社会改革运动是人们在追求社会净化过程中表现出的一种必然特征”^{[17]326},人们相信通过改革可以改善社会道德,让更多的人享受到上帝的福音。以上超验主义和宗教使命观深深影响了贺拉斯·曼的改革理念^[16],贺拉斯·曼以传教士般的热情投入到社会改革运动中。

在贺拉斯·曼所珍视的改革事业中,没有什么比教育更重要。他认为教育改革必须成为所有社会改革的基础^{[6]43-45},这种信念与他的职业经历密切相关。在从事法律和政治工作后,贺拉斯·曼发现,虽然美国的法律逐步完善,法官也不

断增加,但犯罪问题仍像一个毒瘤一样存在着^{[18]12}。另外,“杰克逊民主”时代的到来一定程度上松动了原有的社会地位与政治特权之间的必要联系,在更加自由和民主的社会中,自由权利很可能被滥用^{[8]37-39,46},公民的智慧和道德遂与国家的民主自由更加休戚与共。因此,共和国急需的是一场能够综合启蒙运动的公民目标与宗教大觉醒的进步信念的运动,这便是19世纪30年代兴起的以贺拉斯·曼为主要领导者的公共教育改革运动^[11]。作为一个政治人,贺拉斯·曼高呼学校是“共和国的防线”“是自由坚不可摧的堡垒”,他比任何人更加提倡通过立法来推进公共学校的发展。

实际上,强调通过立法促进公共教育发展的理念并不是贺拉斯·曼的独创,而是对美国早期共和主义教育观的回应^{[19]106}。马萨诸塞州的公共教育传统十分久远,甚至可以追溯到1647年颁布的“老骗子撒旦法”(Old Deluder Satan Act),它要求每个城镇都要建立公共学校来教育儿童。建国之后,许多人都提议过要发展公共教育,尤其是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他在建国初期就有先见地将教育视为一种公共事务,将建立公共学校视为防止暴政、维护共和国民主与自由的手段。随着私立学校的发展,马萨诸塞州上百年的公共教育传统在19世纪20年代走向了衰落。在这种情况下,詹姆斯·卡特(James G. Carter)等第一批教育改革领导者展开了一场致力于马萨诸塞州公共教育复兴的改革运动兴起。卡特认为公共学校的衰落会威胁社会的稳定,加深不同阶层之间的偏见和仇恨,因此,有必要通过立法发展公共学校,让所有学生进入同样的学校学习^{[20]61-61}。在卡特的提议下,马萨诸塞州成立了教育委员会,为贺拉斯·曼领导公共教育改革铺平了道路。虽然贺拉斯·曼只是杰斐逊、卡特等先驱人物的追随者,但他对公共教育的宣传和领导作用却无人能及。

总之,基于青少年时期形成的进步人性观和新教强调的改革精神,贺拉斯·曼在社会改革中逐渐认识到共和国中法律的局限性和学校的重要性。他开始将公共教育改革视为社会改革的基础,在19世纪新教精神的基础上重新诠释了杰斐逊共和主义的教育观——培养合格公民的教育是捍卫共和国民主和自由的堡垒——并将其从知识

层面上升到道德层面^{[21]141}。

3 教育是稳定社会秩序的道德事业

一神论者长期以来一直主张教育是改善道德不可或缺的手段^[22],而贺拉斯·曼坚信普及公共教育比完善法律更有助于解决社会问题,并从法律和政治转向教育事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坚信教育的道德功能是保障社会理想实现的重要因素。因此,把教育视为一种道德事业是理解19世纪公共教育思想的关键,也正是在这点上,公共教育运动带有了近乎福音的宗教特性^[3]。

1837年5月,贺拉斯·曼被提议担任马萨诸塞州教育委员会秘书。在他犹豫是否接受此职务之际,一群纵火犯放火烧毁了他的办公楼,两周后,他又目睹了一场导致大规模抢劫和数十人受伤的波士顿街头骚乱。这些动乱事件的爆发加深了他对社会动荡的担忧,人民需要加以控制和引导,但是不应该通过权力和暴力,而应该用一种更加美国的方式——教育,然而,“受过教育的、富有的、智慧的”人已经放弃了引导和教育人民的责任^{[20]61}。几番权衡后,贺拉斯·曼不顾亲友的反对,毅然决然地投入到教育事业中。贺拉斯·曼在给友人的信中阐述了他的动机:“我已放弃法律,进入一个思想和道德的领域。现在这代人几乎是不可塑的,我正在把努力转向下一代……对前者不会产生影响的力量施加给后者可能会更有效。”^{[6]83}显然,杰斐逊曾探讨过的自由、公共教育以及共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正是贺拉斯·曼公共教育思想的主线。在贺拉斯·曼看来,再完美的政治结构都不能从根本上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只有让知识在民众中广泛传播,自由才能得到保障,因此,“美国的自治实验若离开普遍的教育将永远不会成功”^{[23]19}。乔治·斯普林也曾评价道:“贺拉斯·曼之所以从律师变成一名教育领导者,是因为他相信学校教育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关键所在。”^{[2]14}

公共教育改革能在马萨诸塞州广泛开展离不开人们学校教育观念的变化。在当时,除了贺拉斯·曼及其志同道合的教育改革者,学校已逐渐被一些开明人士视为提升城市生活质量的关键性机构,因为它能阻止新英格兰品格的堕落和城市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的蔓延^{[24]30}。正如他的朋友威廉·钱宁(William E. Channing)所言,“教育

能把人们的能量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当教育委员会在1840年受到抨击、面临废除危机时,正是这种“学校可以促进社会进步”的信念使得委员会最终得以存活^{[20]71}。但对贺拉斯·曼而言,这种信念多了一分宗教“使命感”。提及公共教育改革,贺拉斯·曼认为“这是上帝的指引,以带领人们穿过世界的迷宫”,因此,他将会“竭尽全力为人类谋取福利”^{[6]91-109}。在鼓励亨利·巴纳德(Henry Barnard)的信中,贺拉斯·曼心中流淌的福音主义动力一览无余。他写道:“什么样的事业才是高贵的事业?什么样的事业才能拥抱未来的福音?……欢迎您成为教育事业中的一份子。”^{[24]44}

贺拉斯·曼赋予了公共教育如此强大的社会功能,那么,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教育又如何实现改良社会的理想呢?答案就是通过提供给儿童共同的学习机会,灌输共同的宗教信仰、政治信条、道德标准等,缓解不同教派、党派、阶级之间的冲突,塑造有智慧、理性与道德的公民,从而解决各种社会秩序问题。不可否认,贺拉斯·曼所主张的宗教教育、政治教育、智力教育、道德教育与当时福音教派主张的理念有着惊人的相似,都体现出19世纪美国一神论的理性主义和宽容主义。

在宗教教育方面,贺拉斯·曼极力排斥教派学校,反对劝诫儿童皈依某个教派,主张不加任何主观评论地阅读《圣经》,培养儿童理性判断的能力^{[25]730}。他认为这样的宗教教育能普遍地塑造基督教品格和道德,避免各教派陷入对公共教育无休止的争夺之中,从而缓解宗教对立与冲突。在政治教育方面,他认为学校应远离党派纷争,讲授那些维系人们共同政治信念的共和主义信条,引导儿童通过法律、投票而不是暴力的方式来解决。这样,共和国的儿童就会摆脱狂热的不宽容主义。除了缓解宗教纷争、稳定政治秩序,公共教育提供的智力训练还能促进经济的复兴^{[14]54}。在《第五年度报告》中,贺拉斯·曼特别强调了公共学校开展智育的经济价值,致力于让人们相信教育能够改善所有人的生活境况。他向人们呼吁“教育是最可靠的积累财富的手段”,能从根本上缓解劳资矛盾,因为普及公共教育不仅能减少报复性的暴力行为,还能够打破穷人愈穷、富人愈富的社会弊病,给所有人以平等的机会,消除人为的社会鸿沟^{[25]696-709}。

对于贺拉斯·曼来说,教育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提升道德,进行道德教育是“社会存在的基本需要”,对于减少犯罪问题、塑造理性公民、维护国家民主秩序最为重要,因此,道德教育应该凌驾于其他教育之上。“共和国教育的本质不能仅仅是智慧的,价值观不可避免的要摄入其中”“智慧永远不会主持立法大厅……直到公共学校或其他机构创造出一种更有远见、更纯洁的道德……”^{[25]695}他在很多场合都毫不吝啬地向人们宣扬公共学校的道德教化功能。

要理解贺拉斯·曼对道德教育的强调,必须要提到颅相学(Phrenology)^①对他的影响。贺拉斯·曼在担任马萨诸塞州教育委员会秘书后,成为一位颅相学信仰者。英国颅相学运动最重要的领袖乔治·库姆(George Combe)是贺拉斯·曼入门颅相学的引领人。库姆深信人的可教育性和社会的进步性,并将颅相学作为探究道德伦理、社会改革和教育改革的依据。在颅相学传入美国之时,贺拉斯·曼就阅读了库姆的《人类体格》(*The Constitution of Man*)^②。他称赞这本书将心理学与宗教和谐地结合起来,其中的哲学思想是教育实践的唯一基础^[26]。1838年库姆访问美国期间,贺拉斯·曼与库姆结交为朋友,两人在余生中就教育问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6]132}。库姆的学说成为他设计课程的重要思想基础,贺拉斯·曼确信,虽然社会中的不良倾向不可能完全消失,但可以通过有意识地培养仁慈、道德等品质进行有效的遏制^{[4]109},从而实现更美好的社会。可见,颅相学为宗教复兴中的人性和社会进步观提供了“科学”依据,肯定了教育的道德功能,强化了贺拉斯·曼通过教育改良社会的信心。他称赞公共教育是最伟大的事业,人类进行的各种政体、法律、宗教等方面的探索都未能纠正社会中的恶行和犯罪,而教育是一个未被尝试过的更有前景的实验^{[25]704-705}。如果按照颅相学的原则对儿童进行品格训练,那么旧时代新英格兰的美德将会再次占据上风,教育将取代立法、教师将取代警察,继续为社会的稳定保驾护航^{[6]67-73}。

简而言之,对社会异质性问题的担忧、对法律的社会效能的失望以及对公共教育的道德功能的坚信,是激励贺拉斯·曼投身公共教育的主要因素。接触到库姆后,颅相学更是成了坚定其教育信心的一种“科学”依据。在公共教育改革的实践中,贺拉斯·曼将共和主义的教育观具体化,他设计的公共教育课程成为实现社会改良理想的重要抓手,而道德教育在贺拉斯·曼的教育规划和社会理想中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环。

4 结语

贺拉斯·曼教育改良社会的思想是19世纪上半叶宗教改革精神和社会现实问题的写照。公共教育改革是贺拉斯·曼为解决19世纪上半叶的社会问题、维护共和国民主与自由提出的应对之策,他将教育视为治愈众多社会弊病——贫困、犯罪、无知、懒惰和贪婪等的解药^{[20]61-62},而第二次宗教大觉醒中的人性进步论、新教改革精神与颅相学教育观念构成了他所有教育思想与行动的基础。从教育是人类趋向完善的加速器,发展到教育是捍卫共和国自由的堡垒、是稳定社会秩序的道德事业,贺拉斯·曼一生都抱以虔诚的内在信仰来理解教育与人性、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依托他所设计的课程及教育系统,公共教育便能通过促进个人的完善来实现美国社会的重生^{[24]45}。

19世纪中期的公共教育改革之所以在当时被称为“教育复兴主义”不是偶然现象。在贺拉斯·曼的眼中,教育改革不是一种“任务”,而是和其他人道主义社会改革一样,是一项实现人类救赎的“事业”(cause)^{[24]44}。在担任马萨诸塞州教育委员会秘书期间,贺拉斯·曼平均每天工作15小时以上,他积极地发表演讲提高公众的教育信心,勇敢地与各种保守势力做斗争,取得了突出的工作成效:马萨诸塞州通过了美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义务教育法,公共教育的拨款翻了一番,教师工资大幅度增长,学期整整延长了一个月,新建了50所公共学校,还筹建了3所师范学校,并

①颅相学又称骨相学,是一种有关大脑和性格科学的综合理论,产生于18世纪末的维也纳,19世纪成为最受欢迎的通俗“科学”。19世纪二三十年代,颅相学传入美国,引起美国学术界和大众的兴趣,并被广泛应用于选择职业、治疗精神病、教育子女等方面。参见[英]罗杰·库特:《大众科学的文化意义——19世纪英国颅相学及其认同组织》[M].张丑良,施义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②《人类体格》出版于1828年。在此书中,库姆用颅相学理论建构起一种道德自然法则:快乐取决于智力和道德对兽欲的抑制。道德自然法主张反对既有社会秩序、提高社会道德状况、创造更人道的社会。此书出版后库姆的颅相学开始被广泛应用到教育领域。

改进了教学法^{[7]69}。贺拉斯·曼在马萨诸塞州开展的公共教育改革成为其他州模仿的榜样^{[27]281}。到1860年,绝大多数州都建立了公共学校制度,全国超过半数的儿童已经能得到一些正规教育^{[2]15}。不仅如此,在他的大力推广下,公共教育的观念在美国得到了广泛传播^{[28]258-262},公共学校成为自由主义传统的一部分,为此后美国公共教育的改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福音主义赋予了贺拉斯·曼对教育事业传道士般的热情和动力,但这束“福音之光”却未能照耀普世。宗教的排他性意味着公共学校在宗教和政治方面不可能完全保持中立。在公共学校萌芽之初,它就散发出毋庸置疑的泛新教沙文主义气息。当时,所有的教派学校都被排除在公共基金之外,税收只用于新教公共学校的运作。当天主教徒在纽约争取公共资金开办他们自己的学校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和普遍的反天主教情绪。在爱尔兰裔的天主教穷人眼中,公共学校倡导者们就是一群种族主义者,将天主教的儿童和家长边缘化。所谓的“消除差距”不过是通过塑造“一致性”和“共同性”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控制,成了一种同化工具。从现实层面来看,贺拉斯·曼的教育信心影响了他对美国社会本质的判断。贺拉斯·曼强调公共学校是一个“消除社会上人为差距”的地方,但正因如此,很多富裕家庭让其子女远离公共学校^[29]。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贺拉斯·曼提倡的让所有儿童进入同一个课堂的理想在美国公共学校中并没有实现,贫困犯罪、种族隔离、教派斗争、劳资矛盾等社会问题依然存在。教育变革似乎并没有引起经济和社会的广泛改善,而改革者企图将社会问题的矛头指向教育,反而成为拒绝直接的社会改革的借口。一定程度上说,贺拉斯·曼倡导的公共教育并非是治愈美国社会弊病的一剂“解药”。

参考文献:

- [1] 亚历山大·里帕.自由社会中的教育:美国历程[M].第8版.於荣,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 [2] 乔尔·斯普林.美国教育[M].张弛,张斌贤,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 [3] Jorgenson F P. The American Faith in Education[J]. History of Education Journal, 1952(1): 11-17.
- [4] Curti M. The Social Ideas of American Educators[M]. Honolulu: World Public Library Association, 1959.
- [5] Messerli J C. The Early Education of Horace Mann: Home, Meeting House, and Village[J]. The Historian, 1967(3): 363-390.
- [6] Peabody M T. Life of Horace Mann[M]. Boston: Walker, Fuller, and Company, 1865.
- [7] Compayre G. Horace Mann and the Public School in the United States[M].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 Company, 1907.
- [8] Williams E I F. Horace Mann: Educational Statesman[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7.
- [9] 罗伯特·威廉·福格尔.第四次大觉醒及平等主义的未来[M].王中华,刘红,译.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
- [10] 董小川.美国宗教史研究[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
- [11] Howe D W. Church, State, and Education in the Young American Republic[J].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2002(1): 1-24.
- [12] Knight E W.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M]. Boston; New York: Ginn and Co, 1934.
- [13] Barnard H. Biographical Sketch of Horace Mann, LL.D [J]. Barnard's American Journal of Education, 1858(12): 611-656.
- [14] Cremin L A. The Republic and the School: Horace Mann on the Education of Free Man[M].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57.
- [15] 滕大春.美国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 [16] Messerli J C. Horace Mann at Brown [J].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1963(33): 285-311.
- [17] Norton M B. A People and A Nation: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86.
- [18] Morgan J E. Horace Mann, His Ideas and Ideals[M]. Washington: National Home Library Foundation, 1936.
- [19] 迪安·韦布.美国教育史:一场伟大的美国实验[M].陈露茜,李朝阳,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 [20] Perkinson H J. Two Hundred Years of American Educational Thought[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8.
- [21] 劳伦斯·克雷明.美国教育史:建国初期的历程: 1783-1876[M].洪成文,丁邦华,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 [22] Rives N S. "Is Not This a Paradox?" Public Morality and the Unitarian Defense of State-Supported Religion in Massachusetts, 1806-1833 [J]. The New England Quarterly, 2013(2): 232-265.

- [23] Fenner M S, Fishburn E C. Pioneer American educators[M]. Washington, D C, Hugh Birch-Horace Mann Fund,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1944.
- [24] Katz M B. Class, Bureaucracy, And Schools: the Illusion of Educational Change in America[M]. Expanded ed. New York: Praeger, 1975.
- [25] Peabody M T. Life and Works of Horace Mann(iii) [M]. Boston: Horace B. Fuller, 1868.
- [26] Tomlinson S. Phrenology, Educ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Human Nature: the Thought and Influence of George Combe[J]. History of Education, 1997(1):1-22.
- [27] Hinsdale B A. Horace Mann and the Common School Revival in the United States[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3.
- [28] Hubbell G A. Horace Mann, Educator, Patriot and Reformer: A Study in Leadership [M]. Philadelphia: WM. F. Fell Company, 1910.
- [29] Baines L. Does Horace Mann Still Matter? [J]. Educational Horizons, 2006(4):268-273.

On Horace Mann's Thought of Improving Society Through Education

LI Zijiang, YANG Xuefen

(School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Improving society through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orace Mann's public educational thought. By constantly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humanity, the state and society, Horace Mann formed the educational thought that education is the accelerator of human tendency to perfection, that education is the fortress of defending the freedom of the Republic, and that education is the moral cause of stabilizing social order. The formation of Horace Mann's thought of improving society through education was influenced by the concept of human progress and the spirit of social reform in the Second Great Awakening, and the concept of moral education in phrenology, and it originated from his constantly thinking and practicing of solving American social problems through education. Horace Mann's educational thought and practice promoted the revival of American public education and the spread of republican spirit, but the public education wasn't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s of American society.

Key words: Horace Mann; improving socitey through education; public educational thought; public education movement; the Second Great Awakening

(责任校对 莫秀珍)